

融合与内化

——兼评伯恩斯坦、布迪厄对批判话语分析的理论贡献

何永成

(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 批判话语分析是近二三十年来兴起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方法, 它在文本分析中融入广泛的社会理论, 旨在捕获话语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动态关系, 诸如权力结构、资本交换、互动方式、话语秩序及符号暴力等。但随着分析对象的不断变化, 它需要更多新的、交叉的分析技术与社会理论的融合。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 伯恩斯坦与布迪厄提出了“场域”、“惯习”、“声音”、“语境重置”等一系列新颖的社会学概念, 它们与批判话语分析术语之间建立起了某种特殊关联, 并在融合和内化的过程中极大地丰富和完善着批判话语学理论。

关键词: 伯恩斯坦; 布迪厄; 批判话语分析; 内化; 融合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7)02-0086-06

一、引言

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是近二三十年来兴起的与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相关联的研究领域, 它既是一种理论, 又是一种方法。它批判性地对语言进行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甚而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的研究^[1,2], 但它不以语言的内在结构和功能为研究目标, 而是通过语言分析来剖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3]。批判话语分析发轫于以现代语言学方法来研究文学语篇以及其它话语形类的传统学术范式, 它有着厚重的语言学渊源, 同时整合了自法兰克福学派以来批判理论的研究蕴涵, 并广泛吸收包括哈贝马斯(Habermas)的交往行为理论、福柯(Foucault)的话语与权势理论、巴赫金(Bakhtin)的小说话语理论、海德格尔(Heidegger)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语言哲学、韩礼德(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以及伯恩斯坦(Bernstein), 德里达(Derrida), 布迪厄(Bourdieu)和利奥塔(Lyotard)的社会学理论等重大成果, 凸显为语言学领域别开生面的一支。批判话语分析跨学科的研究范式势必涉及一种“翻译”过程, 也即降低不同学科理论在研究及逻辑对象上的差异。换言之, 把哲学社会科学范畴的相关概念“内化”(internalisation)^[4]为批判话语分析的研究视阈。“内化”其实是一个“催化”过程, “催化”不是把不同理论范畴与关系逻辑进行简单的复制叠加, 相反是去构建不同理论之间更为开放的重新运作机制。诚然, 跨学科性也取决于不同理论之间的对话。从本质上说, 批判话语分析是在社会体系与社会行为的辩证关系中寻求研究对象的, 因而对社会交往互动进行批判话语分析就是要揭示互动的符号语言特

收稿日期: 2006-05-10

作者简介: 何永成(1977-), 男, 浙江宁海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批判话语分析, 外语师资发展

征与社会事件之间的系统关联，同时诠释符号-非符号，话语-非话语之间的转换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理论之间的互补效应不言自明，同时它们与批判话语分析在研究聚焦上也形成了全局性的关联。这种研究聚焦立足于三个层面的分析：交往互动分析(包括互动分析，语言与符号分析，以及文本分析)，社会秩序观照下的跨话语分析，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实践的社会学分析。本文欲借助“概念句法”(conceptual syntax)^[5]的内化规则，来评述伯恩斯坦，布迪厄的社会学概念与批判话语分析术语范畴之间的特殊关联，以期洞悉两者间的兼容性与跨话语性，从而得出批判话语分析是一种辩证逻辑调适下的“语境重置”(recontextualization)机制。

二、“场域”(field)与“话语秩序”(order of discourse)

“话语秩序”的概念是由福柯(Foucault)首先提出来的，但这个有关话语空间结构的概念至今未能同相关社会空间及其规则的整合理论建立起某种系统的联系。探究批判话语分析与场域理论的跨学科联系就是要创设一种衔接机制，从而为各种社会关系提供相应谱系，在这个谱系框架内不同的社会理论能借助经验资料及具体术语得以充分阐释。话语秩序是不同话语实践在社会结构中的表露，它构成了某个社会场域中社会结构的话语要素。可以说，话语秩序是场域所特有的机构话语逻辑，因而话语秩序分析也就成了场域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前，场域与话语秩序都被视为启发式，描述性的概念，借助系统描述，两者均对受不同程度限制的机构群体作出了概念定位。把场域理论融合进批判话语分析的最大益处在于，借鉴布迪厄对场域不同层面之间的关系，不同场域之间的关系，其它场域与权力场域之间的关系，其它场域与阶级斗争场域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探源，话语秩序能在学科演绎融合的过程中得以详尽阐释。譬如，布迪厄曾说，某些特有场域与权力场域之间的相对独立是社会斗争的一个重要动因，这也为社会斗争中产生的不同形式的社会文化实践提供了借鉴。

按照布迪厄的理论逻辑，一切触及话语秩序的相关分析都必须在对场域，惯习(habitus)和资本形式(forms of capital)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内展开。从研究设计的角度来看，布迪厄的社会概念与批判话语分析的有机结合为开展更为翔实的经验课题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换言之，场域关系，场域结构以及惯习的深度刻画为不同话语实践的具体分析提供了学术背景。话语秩序的话语实践除了涉及语言外还包括符号情态，众所周知，话语秩序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审视场域中符号活动与物质活动之间到底存在着何种关系。作为启发式，描述性的概念，话语秩序与场域都动态地指向社会斗争，社会斗争改变了他们之间的界限。正如布迪厄所言：“场域的界限是社会斗争的动因，因而社会科学家的任务不是通过强加某种所谓的操作规则去划分不同的斗争主体，而应去描述这些斗争的状态以及这些斗争主体所在领域的边界设置情况”^[6]。话语秩序分析游走于各类话语实践之间，旨在探讨不同学科的界限强度。而这种跨话语的系统分析也正是批判话语分析的特殊魅力所在，因为交往互动与文本，以及社会结构与社会进程之间的关联就是在话语秩序的调停下建立起来的。面对社会变化，人们需要关注的是在后现代社会里话语秩序的划界与流向是怎样交替的。借助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相关术语，跨话语分析涉及“选择”与“链式”两个层面，也即“聚合”(paradigmatic)与“组合”(syntagmatic)的关系问题。选择分析旨在考察交往互动对话语秩序中弱界限及强界限话语实践的依赖程度。社会变化是在界限更替的话语过程中实现的。语类与话语可以游离于特定的话语秩序，从而作为一种自由的元素活跃于话语网络之间，最终以社会变化进程的话语表征形式，通过新的途径得以阐释。链式分析则把重点放在变化的意义表述上，

它把各类话语实践加以系统连接,并全面勾勒出话语秩序中话语实践的汇通渠道。

选择分析与链式分析详尽阐述了布迪厄对场域关系的解读,进而也考察了变化的话语关系,也即通过对某一话语实践进行“语境重置”(recontextualisation)或“殖民化”(colonisation)后生成的关系。在场域之间生成此类关系,是在对当前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分析的大背景下,用某些统治代码来译介各类话语的一大尝试,此举也保证了资本在场域间的多向流动。跨话语分析是对场域关系进行解读的一个关键层面,它凸显了在后现代主义实践形式复杂,混合的语境条件下社会变化的潜势。

三、“惯习”(habitus)与“声音”(voice)

把场域与惯习的关系在批判话语学的视野中进行内化可谓是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上的一次范式革命。布迪厄把社会看作是一个集聚力于场域与惯习之间的双面体。在社会高速发展变化的时空环境里,惯习与场域无法完全在步调上保持一致,这就容易导致某种程度的关系紧张。然而,惯习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它旨在描述居于某一特定位置的社会个体是如何借鉴常规的体态特性以及语言特性来看待社会的,但它不能解释自身是怎样发生的。诚如 Lipuma 所言,“乍一看,惯习确似一座衔接社会与心理,体系与个体的桥梁,但它实际上无法创设这种关联,因为社会归类与个体间的关系并未完全确立。”^[7]

其实,借鉴伯恩斯坦的“声音”概念,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布迪厄与批判话语分析学派的理论融合。在伯恩斯坦看来,“声音”与交往主体对话语实践不同语境的鉴别能力是紧密相联的,因为一方面它生成了交往主体的“识别”原则,确立了何时,何地,该说何话的得体性标准;另一方面它又铸就了交往主体的“实现”原则,帮助主体成功地开展交往互动,并适时地传递出特殊的信息^{[8](P15)}。“声音”表征着社会个体在符号交换过程中所遵循的惯习性的“存在”,“行事”与“言说”方式。它是一种“语言惯习”,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映衬出场域与社会地位对个体的不同制约与能动。在批判话语学视野中,“声音”就象话语秩序,它得益于个体特殊的话语与语类形构。对社会个体来说,“声音”的话语形构必须服从自身所参与的社会实践规定的权力与控制原则。在话语实践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应该区别话语秩序集聚与声音集聚的问题,这有助于用批判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来考察话语实践之间的关系和摩擦。

借助“声音—信息”的辩证关系,伯恩斯坦的“归类”(classification)与“架构”(framing)理论很好地解构了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归类造就声音,架构构成信息,当声音制约信息时,信息也会潜在地改变声音。声音生成识别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往往会随着交往互动的深入而再次出现,进而削弱声音割裂的密度。声音的割裂,从结构上来看相对持久,从衔接上来看则需取决于场域,惯习,声音等相互融合的场所特征。声音与信息之间的辩证关系,可通过分析声音的集成要素以及作为“符号暴力”的混杂声音对交往进程的制约等方面来得到系统阐释。

四、“语境重置”(recontextualization)、“语类”(genre)与“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与布迪厄不同的是,伯恩斯坦明确意识到了文本分析与语言分析在社会学分析(尤指“教育实践分析”)中的显著作用。他认为,“文本是看得见,摸得着,物质化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征形式。通过分析社会语境中的相关文本,我们能够还原交往互动中的某些本原意象。”^[8]可以说,伯恩

坦的理论聚焦指向于文本与互动，在研究类属和逻辑关系与话语分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指出在教学话语视野中其它话语的表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各类话语在形构上必须遵循“语境重置”原则。乔利亚拉基探讨了伯氏的理论范畴与语类及互文性的话语分析范畴之间的译说关系^[9]。她认为语类范畴可以体现在伯氏的“编码形式”(coding modality)上，并借助“归类”与“架构”得以慧释。这种观点把“语类”视为一种以特定方式引领话语的排序机制，相应地，“语境重置”原则在教学语类的框架内以话语的形式被“物化”。正如巴赫金所说，“语类不是语言形式，语类代表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活动形式，表现为特定的语义内容，风格和特定的成文结构。”^[10]语类一方面生成了主体间不同程度的割裂，另一方面又通过时空来控制交往互动，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批判话语学的理论渊源。

跨文本分析与跨话语分析在教学话语中的应用是批判话语分析的一种重要实践形式，这也为探析“语境重置”原则在教学互动中的具体实效性提供了材料来源。其实，批判话语分析十分注重社会互动的细节，并努力澄清互动中出现的矛盾与困境，在伯氏看来，此类矛盾与困境在类属化过程中往往被抑制，但却常常出现在“信息”合成上。沃罗辛诺夫宣称日常生活中的对话式互动就像敏感异常的晴雨表，它能记录下社会变化在定格为固定社会形式前的微妙过程^[11]。查寻，分析这种微妙过程也正是话语分析与语言分析研究范围内的特有事项。互动中矛盾的隐晦与复现往往涉及到互文性问题。“语境重置”意指对其他话语的选用与安排，如果话语被视作潜在意义，那么“语境重置”就会在对话语进行归类及建立差异对应关系时，有意识地抑制话语的某些潜在意义，同时它也消解不同话语潜在意义间的矛盾。然而，在交往互动过程中，当不同的话语交织在语类网络里，此类矛盾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针对这种情况，伯氏通过引入“矛盾”问题丰富了互文性分析的实质，另一方面，批判话语学又在互文性的研究框架内详尽润饰了矛盾的抑制与复现问题，从而使伯氏理论更趋翔实。

“互文性”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巴赫金的著作里，后来克里斯蒂娃^[12]从巴氏的对话和复调理论中得到启发并对其进行了系统阐述。她认为文本不是自足的封闭实体，任何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变形，互文性就是符号系统的互换。正因为“互文性”概念帮助批判话语学定义了文本的属性，于是成为批判话语学研究现代社会变化话语问题的一个焦点。哈桑指出，“互文性研究空间的拓展暗示着它几乎能不受限制地触及任何声音。但令人费解的是，物质世界以及不同形式的社会交往是出于何种原因，通过何种方式，又在何处对互文性进行阻击的。”^[13]为了避免出现这种问题，“互文性”概念必须同构成话语本身的“暴力”(power)理论(也即葛兰西的“Hegemony”“霸权”理论)加以联结整合。社会语境中的编码定位以及权利控制形式往往把互文性关系镶嵌在特定的社会规则中，同时又解释了在特定话语实践中开展互文性分析的可能性。

五、结 语

批判话语分析并不能直接归入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谱系，它是站在可持续的反语言学传统的立场上，对不断变化着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进行语言、话语、文本、甚而图像层面上的分析与解读。它的理论涉及广泛，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到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的与女权主义的文化研究、布迪厄与伯恩斯坦的社会学、福柯与德里达所创造的各种反本质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与社会哲学，以及更晚近的利奥塔与鲍德里亚的各种版本的后现代性，以及最近的后殖民理论与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可以说，它是在社会科学“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过程中出现的一次理论汇通与内化的高潮。借助社会语言学、种族方法学、语用学,以及叙事文本学的技术手段,批判话语学的分析路径得以一定程度的形式化,条文化。但面对分析对象不断变化混杂的研究困境,它可能需要诸多新的、杂交的各种分析技术与社会理论的融合。布迪厄与伯恩斯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以他们新颖的学术兴趣与研究设想为批判话语学理论趋向臻熟作出了特有贡献。布迪厄主要从“场域”的角度来探讨当代社会的复杂建构问题,伯恩斯坦则倾心于教育场域的研究,他们在后现代理论与特殊类型话语批判分析之间创设了一种有效的衔接机制。从广义上说,他们俩人均可归入批判理论学家行列,但他们又同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保持一定的距离,相反更崇尚某些特殊场域的经验性研究。布迪厄把现代性看作是场域异化和自由化的结果,他的场域理论为解读哈贝马斯源自生活世界(lifeworld)的系统解耦理论(theory of the uncoupling of systems),以及福柯的现代权势理论提供了有益借鉴。对批判话语学来说,场域理论更是话语秩序分析的一大补充。他把“场域”视为斗争的处所,把“惯习”看成场域中由地位结构所决定的系列行动命题。他对社会互动过程中“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与“合法语言”(legitimate language)(Bourdieu,1991)^[14]的阐述也揭示了话语实践对社会关系的建构作用。伯恩斯坦则关注符号控制过程,以及互动中出现的符号转变和代码传输与习得。早年他曾一度涉足权势关系与编码理论的研究,之后对“教学话语”(pedagogic discourse)与“教学机制”(pedagogic device)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教学话语”由“教学性话语”(instructional discourse)与“规约性话语”(regulative discourse)构成;“教学机制”是一种特殊的符号控制机制,下辖“分配”(distributive)、“语境重置”(recontextualizing)及“评价”(evaluative)三类规则。他又用“归类”与“架构”的概念去划分教育知识,“归类”是布迪厄所宣称的“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一种表征形式,涉及矛盾与困境的抑制;“架构”是控制交往互动的一种规约原则。“归类”构成“声音”,“架构”带来“信息”,“声音”与“信息”处于一种互相制约、互为源头的动态辩证关系。正是基于声音-信息的这种关系,伯氏又预设了互动实践中社会变化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 [1] Dubiel, H. Theory and Politics: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eory[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5. 159.
- [2] Halliday, M. Language in a Changing World. Occasional Papers 13[M]. Sydney: Applied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1993. 53.
- [3] Chouliaraki, L N F.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60-63.
- [4] Harvey D.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M]. London: Blackwell, 1996. 161.
- [5] Bernstein B. Pedagogy Symbolic Control and Identity: Theory, Research, Critique[M]. London: Taylor & Francis Ltd, 1996. 92.
- [6] Bourdieu P.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 a Reflexive Sociolog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42-3.
- [7] Lipuma E. Culture and the concept of culture in a theory of practice[A]. In: Calhoun C E L, Postone M. Critical Perspectives[C].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24.
- [8] Bernstein, B. The Structuring of Pedagogic Discourse: Class, Codes and Control(vol IV)[M]. London: Routledge, 1990. 15-17.
- [9] Chouliaraki L. Regulation in 'progressivist' pedagogic discourse: individualized teacher-pupil talk[J]. Discourse &

- Society, 1998, 9(1): 118.
- [10] Bakhtin M. Speech Genres & Other Late Essays[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6. 49.
- [11] Volosinov V.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19-21.
- [12] Kristeva J. The Kristeva Reader[M]. Oxford: Blackwell, 1986. 48-50.
- [13] Hasan R. Rationality in everyday talk: from process to system[A]. In: Svartvik J. Proceedings of the Nobel Symposium: Directions in Corpus Linguistics[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2. 519-520.
- [14] Bourdieu P.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170

Fusion and Internalization: On Bernstein and Bourdieu'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DA

HE Yongch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CDA has been a new method in social research in the past decades. It incorporates a variety of social theories into text analysis and aims at revealing the dynamic relations between discourse and society, such as power structure, capital conversion, interaction modes and symbolic violence, etc. With the constant changes of analyzing objects, however, CDA appeals for a hybrid of new analyzing techniques and social theorie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new times, Bernstein and Bourdieu put forward such novel sociological concepts of 'field', 'habitus', 'voice' and 'recontextualization', which established a specific correlation with CDA terms. Apparently, this kind of correlation greatly enriched and perfected CDA theories during the course of fusion and internalization.

Key words: Bernstein; Bourdieu;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Fusion; Internalization

(编辑: 刘慧青)